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

乙酉 戊寅 甲寅

公元 1765-1-28

乾隆一日

吴十洲 著

A Day of Emperor Qianlong

南开大学出版社



乾隆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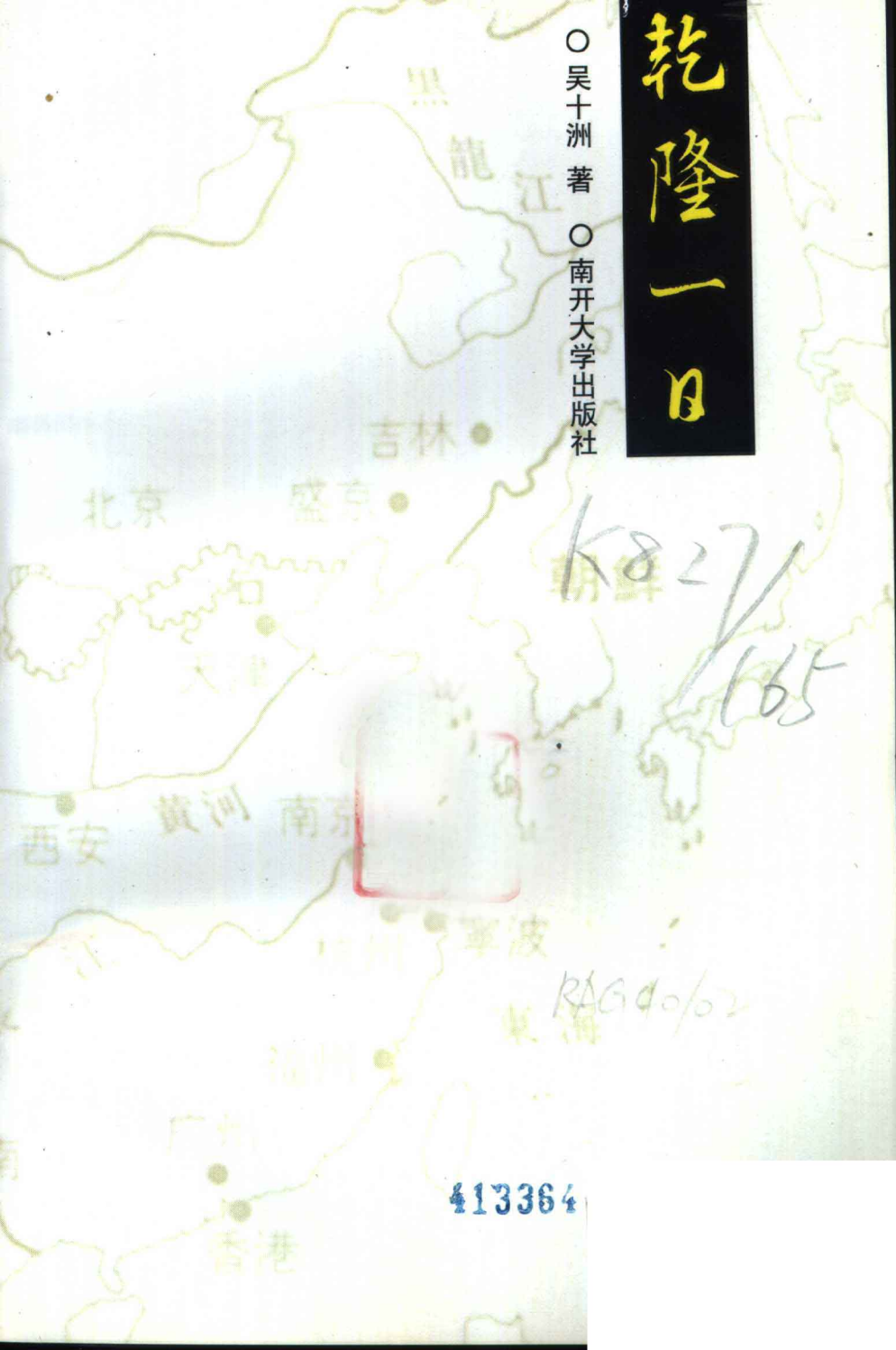
【清】王 昶

乾隆一日



乾隆一日

○ 吴十洲 著 ○ 南开大学出版社



乾隆一日

吴十洲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编 300071 电话 23508542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3 插页:5

字数:277千

印数:1-3000

ISBN 7-310-01174-0

K·87 定价:22.00元

序

吴君十洲的新著《乾隆一日》即将同读者见面，我知道他花了很多的心血，有了令人欣喜的成果，首先向他表示诚挚的祝贺。

当日十洲君携来《乾隆一日》的稿子，要我写篇序言。“一日”的历史书如何写法，我闻所未闻，颇有新鲜之感。追及粗粗阅读一过，我多少明白十洲君的用心之所在。原来：

乾隆一日，系指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公元1765年1月28日）。这一天，既不是冬至、元旦、万寿节的国家三大节日，也不是皇帝有大事要举行祭祀太庙的告庙盛典，亦没有什么班师献俘的大典礼，以至大吏的任免、亡故、赐祭，重大灾情的报告和政府的蠲免，民众的运动，藩属的来朝，等等，一切重要的特殊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个极平常的日子。所以《清史稿·高宗本纪》的纂修者对它未予理会，作了空白的处理，而十洲君选择了它。这是使用了如同社会学的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并无特别的深意，就是要在平常之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或许能从某一个侧面了解乾隆帝和他的时代的历史。

这一天乾隆帝自然有他的社会活动和生活内容，据十洲君在书中附录1所列的乾隆帝《起居一览表》，乾隆帝于清晨6时至乾清宫西暖阁阅览《圣训》，8时至9时与大臣、学士在

重华宫对诗联句,10时至12时于养心殿勤政亲贤殿批阅臣工的秘密奏折,下午1时至2时于养心殿接见被大臣引见的官员,3时披览臣工的题本,4时与军机处领班傅恒面议政事,5时至6时在养心殿三希堂鉴赏书画器物。大致说来,乾隆帝像往常一样批奏折、题本,会见并训饬将有新任命的低级文武官员,为即将启程的南巡作进一步准备,这些是处理政事。与臣下对诗联句,表示君主雅兴和六艺俱精,也是文治的一种表现。联句结束,特赐与会者《石渠宝笈》一部。这部书画鉴赏专著,是乾隆帝不满意过往的这类著作,特命专家和他共同研治的。《四库全书总目》介绍该书云:“我皇上几余游艺,妙契天工,又睿鉴所临,物无匿状,是以品评甲乙,既博且精,特命儒臣录为斯帙,以贮藏殿阁。”作书是乾隆十九年(1754)的事,此后乾隆帝对书画的兴趣丝毫未减,看他这天用两个小时在三希堂观摩书画古董,可知他入迷了。拜读先祖的圣训,从父祖那里获取治国的思想和经验,是实现清朝“敬天法祖”国策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皇帝的必修课,亦是皇家的家法。在这一天中,乾隆帝还有其家庭生活和私生活。

在一天之内,任何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有限的,皇帝也不例外。那么点事,能写成书?原来十洲君采取了投石于水,随波浪扩展的层层推进的写作方法,即以乾隆帝所做的事情为中心,将与其有关联的史实一并写出来,以此做到上下的纵联,左右的横联,这样由点及面,就能把乾隆帝在正月初八日所做的事情前后贯穿起来,作出有头有尾的交待。比如批阅奏折一事,就将奏折的产生过程及其功能,奏折的处理与录副奏折,汉文之外的满文奏折,都涉及到了。如此一来,就可能把事情说得丰满些,原委叙述清楚些。

写作专著,有些内容必须在正文里表达,而有些内容应当写,又不能全写,否则就会造成枝蔓繁生的弊病,因此作者们常常用附录来辅助正文书写的不足。看来十洲君深谙此道,作了十一个附录,都很必要,尤其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皇帝起居一览表》、《乾隆二十九年未至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全国奏报瑞雪情形(汉文奏折)一览表》、《乾隆三十年重华宫茶宴联句大臣事迹出处表》、《乾隆帝后妃一览表》、《乾隆帝皇子皇女一览表》、《乾隆年间北京皇宫全景图》,以便读者将正文与附录对照阅览,接受得方便一些,快捷一些,可见作者为读者想得很周到。

以上是我对《乾隆一日》的写作方法和某些内容的理解,由此我来进一步认识该书的特点和价值,似乎体会到以下几点:

第一,此书的写作是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史书体裁的尝试。古往今来的史书体裁甚多,不讲那些资料图籍,就以近人的而言,有通史、断代史、某个特定时期史、专史、事件史,以及人物传记,此外近期出现以某一年份为限的史书,如颇有盛誉的《万历十五年》。最近听说有史家在组织编写一套丛书,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每一年写一部书,这同《万历十五年》一样,是以年为史。这一信息,可能预示以年为史的著作将会多起来,或许会成为常见的史书体裁。然而以日为史者,尚未听说过,有之,可能自十洲君的《乾隆一日》开始。(当然,我这里是就中国史书讲的,是仅仅就此范围而言,它则不在此限。)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史书体裁的创新,实系大胆的尝试。写一日的历史,剖析极其短暂的历史时间,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历史,也是使用人们运用过但不甚强调的点面

融为一体研究方法，用十洲君的话说是：“《乾隆一日》的写作或许是认识乾隆时代的一种思维模式”（《乾隆一日·后记》），他是就具体事情说的，然而我想他的这种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写一天的历史，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十洲君创新的尝试，理应得到肯定。

第二，内容的选择，别有情趣。《乾隆一日》的内容，诚如作者所说，不是要把政治史放在优先地位，而是要表现那个特定时间的文化与社会（《乾隆一日·前言》）。作者着墨较多的是坤宁宫的朝祭，由此而推展到满人的萨满教信仰、敬神仪式、灶祭、赏吃“神肉”；清晨读《圣训》，如前所述，是遵循家法，温故而知新；在茶宴间，君臣对联句，进行的是高雅的诗歌创作活动，亦是君臣联谊、联欢生活，是庆祝元旦的继续；三希堂鉴赏大内秘藏，非书画文物专家都能得到的欣赏机会，只有“古稀天子”、“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所能独享，但不容否认这是他的文化生活的一项内容；乾隆帝自诩为“十全老人”，可是家庭生活远不是民间想象的那样美满：心爱的皇后死了，另一个皇后却“疯”了，儿子生了十七个，然而殇逝的早走了，不成器的徒然让老子烦恼，害得继承人都不好找，亏得他心硬，强颜生活。十洲君还写到京城正月初八日的祭星习惯。这样，把宗教信仰、诗词创作、文物鉴赏、读书求知等内容的文化生活，君臣交往（人际关系的一种）、家庭生活等社会生活，都容纳到书中。此书确实具有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品味。十洲君在开卷写乾隆二十九年冬天的降雪和乾隆帝的喜悦，农业社会的人们盼望“瑞雪兆丰年”，以便安居乐业，皇帝则因“大有年”而国库充盈，社会稳定，所以疆吏的奏报冬雪和乾隆帝相应的关注，虽不是正月初八日这一天的事情，但是国家的大事，叙述

出来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皇帝是政治人物,如果从此着眼,则应写他的政治活动及其后果。有的著作可以这么写,但不能对每一本书都提这样的要求,否则就会出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公式化作品。十洲君对乾隆皇帝历史内容的选择,体现了他对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的理解,应当说是有个性的,同时也能反映所研究的对象——乾隆帝及其时代的某些特色。

第三,利用档案史料的贡献。要从正史讲,《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朝起居注》所能提供的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的史料就是那几条,自然不能据以写什么专著,《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同样所涉无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洲君乃向清史研究的资料宝库——清代档案索取原料。看《乾隆一日》的附录11《主要参考资料》,首先开列的是:《御茶膳房档案》、《节次照常膳底档》、《江南节次照常膳底档》、《传账档》、《来文簿档》、《宫中穿戴档》、《内务府来文簿》、《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杂录档》、《日记档簿》、《宫中档》、《进等样南果底簿》、《进等样干果底簿》、《总管内务府杂录档案》、《銮仪卫正堂范》、《王公文武大臣等职名黄册》等,以及尚未印行的乾隆朝《内阁汉文起居注》,业已梓刻的有《宫中档案乾隆朝奏折》、《乾隆朝上谕档》。可以说依据档案史料写作,是《乾隆一日》的一大特色;换句话说,没有档案材料,写不出这部作品。说说利用档案,是很轻巧的事情,然而档案素材的搜求,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凡到档案馆查阅档案的学人,就能体会到困难之多,是从图书中搜集资料难于比拟的。十洲君的不辞辛劳,对档案的索取,实乃为写成此书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些档案资料,能给读者以有用的学术成分。如果

仅仅看到该书的档案史料价值,似乎也还不够,它的作者具有较多的文博知识,因而对乾隆帝的书画、古董鉴赏的经历能够作出较成功的说明。

开创写一日之史新方法的《乾隆一日》,无疑有其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材料用得多而必要的深入分析比较缺乏;内容的生动有趣与有的部分写得乏味,不相谐调,如联句部分的单调写作方法令不熟悉联句诗的读者难于卒读;文字运用的功夫,尚待锤炼。相信假以时日,十洲君将会在再版时作出必要的改进。

我很赞成十洲君治学的求实态度,他明确申明:写书的目标,不是告诉读者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以具体的史实供读者去理解。看看宣布给读者以历史规律的著作,有哪些可以令读者满意的哩!那不过是其作者良好的主观愿望,或者是人云亦云,或者是说大话,何尝能给读者以规律性的教益。我国的史学传统,历来讲求“史鉴”,即为人君求治提供历史经验;也注意于“教化”,即根据官方哲学的需要选取史事教育民众。这些都是政治性的功能,所以也使史学取得高贵的学术地位。星移斗换,岁月更新,时代发展到今天,史学的那些政治功能色彩必然黯淡了,而社会功能需要加强。它的读物要能给人以历史知识,用历史的真实启迪读者,增加人们的智慧,从而发挥人的创造力,增强人们的生活情趣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知识就是力量”,能给人以历史知识,历史学的使命就完成得不错了;向往于提供历史规律,愿望固然很好,只是难于做到,恐怕一般读者也不买这个账。故而我赞成史书提供历史知识之说,照这个方向去做点实实在在的学问,因此,我乐于为《乾隆一日》写几句话。

假如要用一句话说出对《乾隆一日》的认识,那就是:这是尝试用新体裁编撰历史的著作,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如果要我为我的这篇小文拟个题目的话,就用“新体裁史书的尝试之作——《乾隆一日》”吧。

冯尔康

1998年9月20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前 言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即公元 1765 年 1 月 28 日。这一天不特见著于后来的历史学著作中，在大量的乾隆皇帝的个人传记中，这一天也未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在编年体的王先谦的《东华录》中，记载这一天的文字只有寥寥几行，实在构不成什么故事情节。

或嫌《东华录》过于简约，那么，《清实录》也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其中尤以《高宗实录》最为宏富，有卷 1500 余，参加纂修者竟有 1202 人，历时九年而书成，为历代实录之最。实录采用逐日记录在位皇帝言行事功的流水帐簿形式，已为人视之为平常琐细。在平均一年为 25 卷的巨大容量中，卷 726 中记述乾隆三十年正月甲寅（初八）日的篇幅只有旧装本的四页纸，合计 625 字，记载了发生在这一天的三件事：其一是皇上与大学士及内廷翰林在皇宫中设茶宴，并用“雪象”为题联句对诗；其二是一件处置原任甘肃武威县知县永宁涉及十余万银两不明所得的上谕；其三是一通军机大臣奏报将吉林乌拉锡伯佐领归属蒙古旗管辖的折文。这三件毫不相关的事，对于乾隆皇帝的政治生涯来讲，实在是平凡无奇。

即便是在隐藏着这一天全貌的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中钩沉爬剔，也可以肯定地说，这一天中并没有什么所谓历史上转

折点的迹象。因此,把这一天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历史学上,不如说是在社会学上,或曰社会史学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天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天,是随机的一天。换言之,它正是乾隆中叶,也是清中期,又是中国古代社会上最后一个盛世的一例标本。

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在揭示“文化”特质的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研究文化的转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之间的接触所引起的变化,是历史学与社会学共同关注的课题。同时,社会学与历史学在关注历史、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时,所采用的角度与方法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本书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首先,《乾隆一日》不是一段寓有某种伦理道德的故事。传统的历史学似乎总是将事件的先后次序贯穿起来,而这本书则是按一天的时辰先后排列,反映了乾隆帝在一天之中从起居、饮食、宗教仪式、文艺活动、政务处理到家庭生活等分散而又连缀的史实,因而从中看不出什么结论性的东西,而是呈现了一个历史场景的结构。

同时,在这本书中政治史不再放在优先的地位,而努力去揭示一种文化发展的动力才是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以一天为背景的历史画卷中,乾隆皇帝的政治生活仅仅是诸多人物活动的一个侧面,他作为政治人物的地位在这里被降低了,而在考察人的本性方面,政治活动只是书中所出现人物的一种风貌。

再者,书中采用的主要历史资料已不再是《清史稿》、《高宗实录》等,而是大量的作为历史证据的档案资料。传统的清史,在选择资料时,直接或间接掺入了编写者的意志,资料组成的首要动机是寻找那些感动编写者的非常事件和非凡人物,或是来自某种政治上的要求。这本书则是尽可能更加广泛深入地利用这一天的档案资料,它们中间的多数是未经后来历史学加工过的第一手素材。

即便是一天的平凡的历史,也是内容丰富而且错综复杂的场景。这本书试图在事件相互纠缠而无法解决的因果关系中,抽象出至少相对稳定的结构类型。这里所说的结构,往往因这一天的日程而成。譬如:重华宫茶宴对诗的参与者形成了朝廷中央核心机构的官僚群体;上报奏折的人们组成了封疆大吏的官僚群体;而乾隆帝在养心殿召见的臣工又构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群体,这些群体各自在以皇帝为轴心的政治体制内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归属着三个相对封闭的不同的官僚结构,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利益与不同的价值观念。虽然,他们之间存在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但却不以晋升或相互转换为人物关系的纽带。

另外,这本书强调了处在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的乾隆帝,一个 55 岁年龄段的皇帝。由于参照了这一年龄段的生理特征与心理特征,因此据这些不同的标准对乾隆皇帝得出了新的结论。譬如:将乾隆帝从一般意义上“风流天子”的流言中开脱出来。

还有,本书试图说明事实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在陈述了一天之中大量彼此无甚关联的事物之后,必须去做的一项工作。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把这一天放在一个更为广泛

的历史场景中来表现，这一天的记述将是毫无意义的。譬如：在这一天的活动中，鲜明地呈现出满洲宗教文化与汉族士大夫文化的殊异，这在清宫的一天的典仪中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而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竟是一个统治中华的满族皇帝。一方是精致典丽的汉族儒家文化，另一方则是粗犷野蛮的萨满教文化，乾隆帝既要利用儒术治理国家，同时又要强化满族本元文化的“国语骑射”，而满族人的政治统治愈走向成熟，也就愈远离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最终将自身作为祭品，走向了民族文化衰落。

二

乾隆朝是有清一代的隆盛之世，而乾隆三十年又是这盛世中的极盛。是时，乾隆帝对西北边地的军事行动已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也进入了和谐发展，政治安抚的新阶段。乾隆二十二年，国家府库存银为 7000 万两，达到了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的局面。这时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总额与国内贸易总额，均居世界各国之首。乾隆时期上半叶的中国农民要比欧洲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的农民吃得较好一些，而且也较富裕，一般受教育程度也较高，这是世人公认的事实。康乾盛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有数的几次盛世之一。这样的盛世，据《孔圣枕中秘记》的说法，需要九个甲子，也就是说 540 年才可能出现一次。按孟子之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要五个世纪之久。因此，以王道盛世为现世理想追求的汉族儒生们自然地与盛世圣王的现实相契合，成为了异族统治的拥护者。

乾隆盛世的社会经济在康熙年间得到恢复的基础上,继雍正之后取得了稳定而持续的发展。

“摊丁入亩”于康熙末年提出并予试行,最初是广东省。到了雍正元年,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奏请,正式在直隶实行,然后颁发诏令,在全国推行。此后经过半个世纪,全国相继实行。到了乾隆四十二年,贵州省最后宣布实行为止,各省只有盛京因“户籍无定”没能实行外,一律推行了“摊丁入亩”的税制。

由于“摊丁入亩”的实行,不久便出现了空前的以人口与耕地的迅猛增加为特征的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加上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农业品种的多样化,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有人估计当时全国生产的粮食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投入市场。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工有了明显的扩大,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手工业部门,也相应地出现了专业化的农业区域。它不但扩大了手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而且引起和加快了农业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从而造就了一派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

在一个如此鼎盛的历史时刻,乾隆皇帝又要面临哪些问题呢?自古以来,圣王多承衰拨乱而起,由此开辟盛世前景,而桀纣之类的昏君也正是于圣王盛世之后骄逸妄行,最终丢弃了天下。他们也是圣王之后,但同时又是一代王朝的败君。其实,这一盛一衰又何尝不体现在一世君王的身上,尤其是像乾隆帝这样一位当朝整整一个甲子的皇帝。就好像水在结成冰时,就已经存在着融化的全部内在要素一样,一个由盛而衰、极盛渐衰的循环周而复始,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一代盛世明君,最终在晚年作了挥霍无度的“散财童子”,实在是令人深思的历史悲剧。

此外,隐匿在乾隆盛世后面的危机之一是,清朝经过百年的治理,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形成,满族人的政治统治已经巩固,然而,两千年前孔子所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①的预言开始显现,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②的章句像是幽灵一样笼罩在乾隆帝的心头。当清王朝在全国的政治统治愈趋成熟时,其夷狄之本元文化却趋于衰落。当年在黑水白山奉祭的萨满之神只能关起宫门作为爱新觉罗氏的家祭,骁勇善战的八旗兵也被封禁于柳条边以外,所谓的国语骑射早已是强弩之末,在这一年(1765年)八旗大臣的子弟被一体获准参加科举考试。满族人的全面汉化,就在乾隆帝的眼皮底下迅速地蔓延开来。

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丙辰日,户部议奏曰:“八旗积存地亩一万五千余顷,请择可编官圈者,分设整分半分庄头数百名,即于现在庄头子弟内,选择安放。”为此,乾隆帝下旨曰:“户部所有八旗积存地亩一项,折内酌议分设庄头之处,著照所请行。但安放庄头,需地不过三四千顷,所余尚有一万顷之多。此等皆系老圈旗地,且发帑赎回者,十居七八,原应行入官地亩,徒交地方官征解,适滋胥吏侵肥,旗与民两无裨益。著将此项交内务府派员经理征收,俟原帑按数归清之后,即将地亩赏给八旗,作为恒产。”^③旧制度的衰落与经济权力的再分配已不可避免。然而,乾隆帝却竭力地强化满洲传统文化,维护

① 《论语·八佾第三》。意思是夷狄有君主而无礼,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而有礼义。

② 《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我只听说过用中国来改变蛮夷之邦,没有听说过用蛮夷之邦来改变中国的。

③ 《高宗实录》卷 665 页 11。